

專業與大眾的橋樑——由幾個民族學展示談起

喬宗慈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壹、民族學與博物館

民族學在十八世紀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植基於演化論或傳播論的假設，以及大量由商旅、傳教士、殖民官員作成的記錄，此一時期西方學者視異民族為活化石，為西方文明過去生活的樣本，工藝技術的水準是分辨文明高下的主要標準。直至廿世紀民族學才發展出獨特的研究方法與學科目的。民族學的基本精神乃視人類社會為一整體，研究興趣涵蓋人類生活的所有面向。同時因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因田野工作長時間接觸，而使民族學家視所研究的社會為獨立的個體，以比較各社會的異同及解釋產生異同的原因為目的。更重要的，西方民族學家相信藉著了解異文化，可以促進對己文化的了解甚至反省，而收攻錯之效。由於學術傳統及與殖民政權關係不同，歐洲各國民族學研究的主題各有所重。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殖民地紛紛脫離母國成為獨立的國家，許多民族學家失去了自己的田野，且在己社會要求研究成果『有用』，遂轉而研究己社會。同時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嚴重不平等的批評，使西方世界認為只要解決貧窮問題，便可以遏阻共黨國家擴張勢力，投入大筆金錢及人力來『援助』開發中國家，人類學家也參與其中提供意見。使人類學家意識到原先視每一個研究對象為獨立的單位，忽略了許多重要現象。每一個社會其實都是一個更大社會的一部分，和其他社會以各種方式互動著。

隨著教育水準普遍提高、人權意識日漸勃興，及由中南美洲、法國引入的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及結構馬克斯主義，民族學家認識到人類社會的種種不平等及剝削的現象，及全世界因著經濟體系的運作，實是緊緊相扣的事實。透過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結合在一起。

在演化論盛行的時代，因工藝技術是分類的重要標準之一，且民族學之下各個分支尚未分化，征戰、探險活動、商旅、田野所收集的異民族工藝品集中於博物館，博物館是民族學教學研究及向公眾推廣民族學的重要場所。然隨民族學發展及西方世界社會條件變動，民族學與博物館的關係視各國民族學研究的興趣及學科與殖民政府關係而有所不同。在對我國民族學影響較大的美英兩國，民族學

和民族學博物館關係日趨淡遠。

民族學研究領域中以物質文化和博物館的關係最為密切，在演化論與傳播論盛期，物質文化是當時民族學大師如E.B.Tylor、A.C.Haddon、A.L.Fox Pitt-Rivers等人的研究重心之一。這個領域自結構功能論興起之後便趨衰微，與民族學主流分道而行。雖然物質文化研究衰微至一九八〇年代才再度受到重視，但研究旨趣、分析方法和早年的物質文化研究大異其趣，著重象徵意義、生產分配等主題（Miller 1987）。

博物館中民族學領域的運作並未因民族學物質文化研究衰微而衰退，仍持續發展，民族學藏品持續增加、不斷推出大小型民族學展示、出版物質文化及民俗藝術的出版品（Nason 1987）。增加的標本之中，除田野收集者外，有部分購自代理商或拍賣場，而以私人捐贈者為大宗。民族學的相關展示則由博物館中的民族學家或根據本身的研究所得、或根據相關區域的研究成果、或根據館藏的特色來策畫相關的展示。這個現象說明了博物館具有獨特的性質，不必然與學科相結合，這與博物館的收藏功能及新起的教育功能有極密切的關係。

貳、博物館的展示

在常用的博物館學入門書——『運作中的博物館（Museums in Motion）』一書中，Alexander 將展示定位為博物館最基本的活動（the most basic activity）（Alexander 1987: 191），以達成博物館教育與娛樂的目的。所謂展示乃指為了與參觀者（通常是一般大眾）溝通而作的材料展覽或陳列（a showing or display of material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with an audience, often the general public）（Ibid: 175）。一般博物館展示多以傳遞知識為主要目的，同時應符合真實（authenticity）、富吸引力（attractiveness）及具溝通效果（effectiveness of communication）三項標準。

自一九二〇年代以降，博物館的展示有長足的發展，乃受到以下幾股潮流的影響：（一）西方社會持續民主化，使博物館成為以服務公眾為主的教育文化機構；（二）萬國博覽會戲劇化及有條理的展示方式；（三）百貨公司的櫥窗陳列方式；（四）當代藝術及建築思潮，特別是包浩思（Bauhaus）的影響（Ibid: 175）。有鑑於以往展示太過資料及物件（objects）取向且陳義過高，忽略參觀者的需求與理解能力，兩位加拿大電子媒體專家——Marshall McLuhan 及 Harley Parker 於一九六九年提出博物館展示應利用電子媒體以刺激參觀者的視覺聽覺，以達成博物館寓教於樂的目標。在博物館展示中使用電子媒體引起許多爭議，教育效果也待評估（Ibid: 186-187），但這類展示媒介（media）受廣大公眾

及兒童喜愛，現已廣為各類博物館採用。

荷蘭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前任館長P.H.Pott曾將博物館參觀者動機分為三類：（一）滿足美學需求；（二）滿足浪漫情懷；（三）滿足知性的需求。博物館工作者在構思、設計展示時，這三類動機是決定展示目的的主要依憑，因此規劃展示有三大與前述三類動機相對應的進路（approaches）——（一）美學的（esthetic）；（二）能喚起情感的（evocative）；（三）知性的（intellectual）（Munneke 1980: 86）。三者之間雖非互斥，但必需排出優先順序，作為展示設計的考量。

荷蘭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H.H.Frese 把民族學展示當成文化傳譯（cultural translation）的過程，包含兩個連續階段。第一個階段乃是整理出田野所獲及相關的文獻，本質是科學的。第二個階段則是溝通第一個階段所收集的資料和博物館參觀者既有的知識間的差距，本質是教育性的。第一個階段重傳譯的科學，第二個階段則重傳譯的藝術（van Wengen 1990: 179-180）。民族學的展示雖是在博物館工作的民族學家發表研究所得的一種方式，但因展示實為向一般大眾溝通以達成教育、娛樂目的的活動，自有其特別的考量。

由展示的角度而論，民族學展示的發展恰可用荷蘭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展示的三個時期來說明。G.D. van Wengen 把該館的展示分為三個時期：（一）一八三七至十九世紀末，為奇珍陳列時期，各類標本隨興放置在陳列室中；（二）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至一九五〇年代，為美學式陳列時期，乃受荷蘭的藝術家影響，自美學角度來展示標本，以展示物的方式來展示民族學標本；（三）一九五〇年以降，該館民族學展示轉以一個概念（concept）為導向，展示目的除推廣知識外，更強調喚起參觀者的認同感，引發同理心（van Wengen 1990: 177-179），一九五二年由Adrian A. Gerbrands策畫之『日常生活中的外來品（Familiar Things of Foreign Origins）』^a 展示是這個轉變的里程碑，該展示以Ralph Linton的『人之研究（The Study of Man）』為基礎。

各國博物館展示發展至今，奇珍式的陳列已極為罕見，美學式的展示仍偶可在民族學博物館或自然史博物館見到，但所占比重極少。概念導向現已為民族學展示的主流，但因各國學術傳統、教育哲學及各館建館目的均有所不同，民族學相關展示也有不一樣的風貌。

參、民族學展示的幾種可能方式

民族學展示指將民族學標本、相關記錄等材料陳列出來，向以一般大眾為主的博物館參觀者，介紹民族學的相關知識。概念導向具體表現為展示，有許多種

可能性，謹就筆者參觀過之民族學展示，作一分類。以介紹某一或某一區域文化的展示最為常見，為民族誌式的展示；其次則為自比較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某些現象的異同。再者一種學說、特定工藝技術、單一生活用品或者一位研究者都是一個可以發展成展示的概念。以下便各舉一、兩個展示為例，分析其蘊含的民族學知識，並簡述展示內容及使用之素材。

一、某一文化或某一區域文化

澳洲博物館（Australian Museum）『原住民澳洲（Aboriginal Australia）』屬此類展示。這個展示以複製的澳洲原住民岩畫，銜接在人類演化展示之後，象徵文化的起始。以『原住民的澳洲（Aboriginal Australia）』命名，同時表達了澳洲原為澳洲原住民的生活地及澳洲歷史應溯及原住民時代兩種理念，具有重要的政治及歷史意涵。展示依序為（一）不同自然環境的澳洲原住民生計活動，如叢林、海邊等，使用等比例、小規模的情境展示；（二）澳洲原住民的特質，如語言、分享、共食及醫療知識等，以標本、圖片為主；（三）澳洲原住民的次級群體及其象徵，和世界許多部落社會一樣，澳洲原住民實由許多不同的文化群體構成，每一群有以神話傳說為主題的圖案，一般施繪在盾牌上，成為該群體的象徵，以盾牌及相關傳說的文字說明來展示；（四）澳洲原住民與史前遺址，展示一個探坑的層位及週遭環境；（五）澳洲原住民變遷，包括文字文件敘述殖民史、以視聽媒體表現對原住民的多元看法、澳洲原住民運動活動照片及文字敘述、一個現代澳洲原住民居住單位的等比例模型，來說明當代的澳洲原住民生活方式與社會參與。此一民族學的展示方式較接近民族誌式的敘述，參觀者可對澳洲原住民有粗略的認識，知性的成分居多。其中視聽媒體表現的多元看法以透明壓克力版區隔出半獨立的小型演講廳，中間約視線高度置廿吋電視，重覆播放，有面對面的效果。

荷蘭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是皇家熱帶機構（The Royal Tropical Institute）的附屬機構，熱帶基金會是一個以研究及農業、醫療援助熱帶地區的私人基金會，因此熱帶博物館特別注重熱帶地區現況的展示，以給參觀者感同身受的經驗為主要的目的。該館墨西哥市特展，以阿姆斯特丹市地下鐵入口為入口，參觀者由地下鐵入口進入墨西哥市的過去與現在。展示場中有墨西哥市的街景放大照片，充滿了墨西哥市的人車聲、叫賣聲，甚至有一個依原店擺設的小店，由來自墨西哥的人經營，參觀者可以體驗墨西哥市的生活經驗。由於水利系統對阿姆斯特丹市非常重要，展示中特別就考古資料復原當時水利系統，以模型表現；另以圖繪文字說明墨西哥市現有的水利系統。研究者選擇墨西哥市乃因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希望阿姆斯特丹市民可以有不同的城市生活體驗，進而去

關懷大型都市可能產生的問題。使用的素材包括少數阿茲特克時期標本、照片、錄音、模型、情境展示。展示的目的及效果喚起情感的成分居多。

二、以特定主題呈現比較觀點

澳洲博物館的『生命禮儀』的展示屬此類展示。乃就創始神話及出生、嬰幼兒期、青春期、成年、青春期、結婚以及死亡和人一生地位改變有關的儀式，利用文字、標本、圖片及情境展示，依成長順序向參觀者揭示人生重要變化的普遍性，同時藉其他文化的經驗來看己社會中的青少年問題。將民族學家尋求人類社會的通則（universality）的精神以特定的儀式表現在展示中，參觀者可以學習到無論膚色、區域、語言，人類社會有許多共同的問題，每個文化以不同的方式表現來解決。知性的成分居多。

三、學說闡釋

牛津大學的彼特李佛斯博物館（Pitt Rivers Museum）為此類展示的代表，該館為紀念著名人類學家A.L.Pitt Rivers 而設，擁有十分珍貴的藏品，以輔助牛津大學的教學為主要的目的，近年亦有走向大眾教育的趨勢。該館展示最大的特色是不考慮標本的來源地、材質，而以標本的功能為鋪排的準則，這種展示方式是Pitt Rivers 倡議的，他認為人類觀念（human ideas）藉著人類工藝製品表現出來，可以比照生物分類一樣加以分類，人類觀念也像生物一樣由同質演化為異質。因此若能收集到足夠的物件，便能將觀念的承繼（the succession of ideas）在博物館中陳列出來（Blackwood 1991: 1-3）。由於該館的主要目的在輔助牛津大學的民族學教學，展示室中陳列了非常多標本，一個玻璃櫃中可能陳列數十件標本，乍見之下會以為進入典藏庫而非展示室；在一個中庭及兩層樓的廊道中，展示五十五個主題。展示以標本為主體，有極為簡單的主題標示及標本說明。對一般參觀者而言，展示的分量太重了些，而展示的手法可能也很難吸引參觀者。該館展示知性成分居多實無需贅言。

該館的另一個陳列室『包佛建築（Balfour Building）』在一九八六年開放，以陳列樂器為主，雖亦秉承Pitt Rivers 的基本想法，但空間安排開闊得多，使用的素材也較為多樣，包括標本、影片、照片、錄音，最內側的展示中陳列全套甘馬朗（印尼樂器），供教學演奏之用。

四、特定工藝技術

大英博物館人類分館的『墨西哥的土耳其玉馬賽克（Turquoise Mosaics from Mexico）』屬於此類展示。在阿茲特克文化中，馬賽克工藝多施用在儀式用的冠帽、祭器上，因此展示之中特別描述該文化的宗教信仰。展示分為五個主題，依動線順序分別為：1. 阿茲特克文明簡介（The Aztec）；2. 宗教及神

新（Religion & Gods）；3·Quetzalcoatl歸來（The Return of Quetzalcoatl）；4·神新之恩賜（Gifts from the God）；5·馬賽克工藝（The Craft of Mosaic Work）。該展示室燈光微弱，營造出莊嚴肅穆的氣氛，十餘件精美的標本，分別放在展示場四周及中間，投射出的燈光使標本在暗淡的展示室中分外引人注目。該展示知性的成分居多，同時也使參觀者感受儀式的神祕莊重。

五、單一生活用品

荷蘭熱帶博物館的『煙草文化五百年（500 Years of Tobacco Culture）』屬此類展示。煙草是荷蘭人生活的一部分，頗具特色，到處可見販售煙絲及捲煙紙的商店，遠比紙煙普遍，在紙煙煙絲資訊處（Information Office Cigarette and Shag）贊助下推出這個展示。展示場雖然不大，但卻包羅了煙草的歷史、和信仰的關係、煙草與世界諸國、抽煙習慣、煙草與健康的內容。展示提綱如下：1·煙草文化五百年（500 Years of Tobacco Culture），介紹煙草利用史及荷蘭的煙草史；2·煙草—高貴的藥草（Tobacco: Noble Herb），介紹歐洲（特別是荷蘭）如何使用煙草，及與階層、階級和貿易的關係；3·遍及世界的煙草（Tobacco Worldwide），介紹歐洲以外地區如何使用煙草，區域遍及日本、印尼（原荷蘭殖民地）、大洋洲、中東、非洲等，并說明了煙草使用的共通點及歧異處；4·獻給神與魔的煙草（Tobacco for God and the Devil），說明煙草和信仰的關係及關於煙草的信仰；5·煙草與健康（Tobacco and Health），呈現關於抽煙對健康危害的統計數字及不同的觀點；6·煙草事業的歷史轉捩點（Tobacco: Historical Moments），介紹煙草在戰時的情形、包裝及若干對煙草利用有重大影響的煙草公司，如以女性為銷售對象的維琴尼亞（Virginia）；7·煙草—男與女（Tobacco: Men and Women），說明兩性抽煙習慣的差異；8·煙草—夢幻世界（Tobacco: Dream Worlds），說明紙煙、煙絲與形象模型。使用的素材有煙草標本、煙草公司廣告、文字、照片、影片、圖繪等等。將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的煙草的來龍去脈，各種面貌以趣味知性並重的方式呈現出來，使參觀者對煙草有全新的認識。知性成分居多，但因主題切身有趣仍吸引相當多參觀者佇足。

六、以研究者為核心

大英博物館『非洲印象：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九年的依米爾托代與剛果藝術（Images of Africa: Emil Torday and the Art of the Congo, 1900-1909）』。展示廿世紀初期民族誌學者Emil Torday 在非洲剛果（今薩伊）收集的標本，留下的照片、紀錄。依Torday行進的順序介紹不同部族的分布、器用、工藝及交互的影響，素材以標本、照片為主，輔以文字、圖繪。這個展示除介紹本世紀初的剛

果也向參觀者說明Emil Torday 的生平、研究的情境及標本採集的背景，簡單地描繪出民族誌學者的工作，及Torday收藏的重要性——歐洲人發現非洲有十分繁複精美的工藝品，且這些工藝品都極具藝術價值。兼具知性及美學兩項考量，展示場簡單寬敞，參觀者可靜心欣賞。

肆、結語

民族學研究與民族學博物館（或自然史博物館）在十九世紀到廿世紀初期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民族學研究成果保存在博物館中，博物館是民族學學院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重要場所。但隨民族學理論發展，與博物館運作日漸走向殊途。在這段時間，博物館自身有極大轉變，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公眾服務的角色日益明確，具體表現在展示方式的改變及教育功能加強。

兩百年來，民族學展示由奇珍陳列發展為概念的鋪陳，所使用的展示素材也由標本發展為標本視聽材料、文字、圖片，甚至邀得該民族在現場表演歌舞或傳統技藝。所鋪陳的概念可能是介紹一個文化，或自比較的觀點來看一普遍的現象，或者介紹一位民族學家的田野歷程，或是一種技藝等等。展示的目的同以教育為主，但訴求的方式卻各有不同。

民族學展示雖受到種種因素影響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百年來博物館已發展為以服務、教育、娛樂大眾為目的的社會機構，有不同於學術研究及學術教育的社會教育功能。學術研究在博物館中，不僅以論述形式發表，更應具體發揮其收藏、展示及教育等機能，成為博物館營運的樞紐。

正如Freese 先生所言，民族學展示是一種文化傳譯的工作，有科學的性質也具有藝術的成分。如同所有的設計工作，什麼樣的方式、怎麼樣的訴求最能打動參觀者，達到展示的目的，箇中巧妙存乎一心，沒有一定的規則可循。認識展示工作與研究工作的差別是重要的始點。

參考書目

Alexander, Edward P.

- 1987 *Museums in Mo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Functions of Museums*. Nashville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Ave, J.B.

- 1980 *Ethnographical Museums in a Changing World*, in W.R. van Gulinck, H.S. van der Straaten & G.D. van Wengen ed., "From Field

"case to Show-case": 11-28. Leiden: 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

Blackwood, Beatrice

199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itt Rivers Museum. Oxford : Pitt Rivers Museum.

Miller, Daniel

1987 Things Ain't What They Used to B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ews 59: 5-7.

Munneke, R.J.

1980 The Bazaar in Market-Tow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Method and Presentation. in "From Field-case to Show-case" W.R. van Gulik, H.S. van der Straaten & G.D. van Wengen ed. PP.85-96. Leiden : 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

Nason, James D.

1987 The Determination of Significance: Curatorial Research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in "Material Anthropology: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Material Culture." Barrie Reynolds & Margaret A. Stott ed. PP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van Wengen, Ger D.

1990 Representation in Anthropological Museums. At the Crossroad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Museology. in "The Languages of Things : Studies in Ethnocommunication". Pieter ter Keurs & Dirk Smidt ed. PP. 175-188. Leiden: 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